

近 50 岁“高龄夫妻”两年多时间花了十几万

艰难求子路，试管夫妻为何在坚持

两年多时间花了十几万……

李思(化名)是这次采访中年龄最长的一位,49岁。2019年年底开始,她和丈夫在求医问药生孩子的道路上,辗转浙江、南京、上海多地。

一开始,李思去的是浙江本地的医院,中西医都看了,没有结果,夫妻二人又在医生的建议下前往南京妇幼保健院,才开始了试管婴儿之路。此次采访时,她完成又一次取卵。

做试管的这两年多,夫妻俩前前后后花掉了十几万。

高龄备孕之路尤其曲折。“中间做过宫腔镜,还做了个息肉,说是影响着床了。在南京做试管,取了三次,只配了一个囊胚,移植后也没有成功。”离开南京,他们下一站又来到了上海的医院。

“经济上的压力很大,各种医药费用,做染色体鉴定等等,我们还吃中药吃了两年,都是钱。”

对于外地的李思来说,住宿路费也是不小的花销:“月经期开始要跑好几趟医院。按照医生规定的时间,早上8点我们就要到医院来抽血做B超,那前一天就要到上海,为了节省点路费,都是坐慢车,坐两三个小时,晚上住很便宜的旅馆,两百一晚的。月经周期隔个几天就要打一次针,这么多天我都不能回家,一直住在旅馆里。”

“钱都用空了,我都不敢想,十几万就下去了。”

做试管后,原本在外贸行业上班的她停掉了全部的工作,“再工作的话吃不消,怕对身体的消耗大,想在家休养休养,我就停掉了工作。这两年都是办灵活就业自己花钱交社保。我们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,等后面想回去也没有工作机会了,这个年龄让我出去找也找不到。”

两年时间,李思的家庭全靠老公一个人的工作收入,“他压力也很大”。

即使对于双职工夫妻,从备孕失败到转向辅助生殖治疗,对抗不孕,同样意味着额外的经济压力。

Vicky今年35岁,采访时刚刚完成建档,尚未进入试管婴儿周期。

对于经济上的顾虑,她觉得主要来自于不可预测:“如果知道这个事情要花10万块钱,我就会准备10万块钱,如果是5万块钱,我就准备5万块钱,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规划下一步的财务安排。”

“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,有房贷有车贷,压力也大。”在上海做语文老师,今年31岁的小林说试管婴儿进医保的确减轻了不少经济上的压力。

6月1日起,上海做试管婴儿可医保报销。随着近年来不孕不育人群数量的增加,这一政策有望惠及不少不孕夫妻。

做试管婴儿的夫妻,听起来是离很多人很遥远的人群,但事实上,我国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需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。在全球,1/3辅助生殖技术是在中国完成的,上海每年辅助生殖周期数在10万以上。在试管婴儿的道路上,他们走过了怎样的路?

近日,新闻晨报记者集中采访了多位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患者。

这其中有近50岁的“高龄夫妻”,做试管两年多时间花了十几万,妻子辞职全身心投入,打促排针打到整个肚子淤青,但夫妻俩还要“坚持到底”;也有年轻的试管妈妈,备孕多年经历一次次的期待落空,第一次来到辅助生殖医学科,说着说着就在诊室里哭了起来。

采访在他们面诊间隙中穿插,每个人都行色匆匆,有的要去做下一项检查,有的要赶回去上班,还有的要去赶高铁。

当有人在坚持丁克,这世界上,还有另一群人在艰难求子,他们有的故事沉重,有的性格乐观,但无一例外,都充满对生命的期待与珍重。

医药费、检测费用、营养费……花的钱不少,生育大事的钱,没有人能省、也不想省。

Vicky的丈夫来自马来西亚,因为丈夫的原因,两人比较过上海和马来西亚的试管技术。

“国外更便宜,”但因为工作在上海,二人选择在上海做试管,“不过上海现在可以报医保,就不一定比国外贵了。国内还是非常严谨的,需要遗传和男科两个科室给出报告结果,辅助生殖医学科的医生才可进入试管阶段。外国试管的选择更自由,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和需求选择做哪一代技术。”

“没想到生个孩子这么累”

光是从促排卵到取卵到胚胎培植到移植一个完整的周期,李思已经经历了三次。打针、取卵、移植,在她看来,每个过程都很痛苦。

“又长又粗的促排卵针往肚子上打,一针针地打,到后面肚子上全都是淤青。取卵虽然是打全麻,但是我还是知道我是疼的,回程的时候坐在火车上头都是晕的,不舒服也只能忍着。”

李思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取卵,“我每次只能取到一个卵。有时还没有取到,自己排掉了。”

痛苦不仅是身体的,也来源于精神上的压力。“比起针头上的痛苦,最害怕的就是每次验结果,等待的期限太长了。每个月都有希望,每个月促排完了之后又没有。”在做试管之前,小林就打过针促排卵,然而等来的却是一次次落空。医生让她打促排针,做三个周期就差不多了,她还是坚持了五次。

小林第一次来到辅助生殖医学科时,跟医生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经历了两年的备孕失败,怀上过最后却生化妊娠没有留住孩子,小林说虽然知道这是缘分急不来,“但我对这个事情还是很上心。”

一位生殖内分泌科有过多年辅助生殖治疗经验的医生告诉记者,来做试管的这些不孕夫妻,不少都有情绪的问题,备孕多年,已是身心俱疲,失眠焦虑,并不少见。

有试管妈妈告诉记者,一个人躺着手术室,眼望着天花板,心里不停地想:“为什么是我呢,为什么偏偏是我不行呢。”

压力不仅在女方。“有时候我老公也有压力,压力一大,取精也有困难。”李思说道,“他还有工作上的事要操心,白天他上班我在家或者是去医院,没空交流,晚上两个人唠唠说。”

“没想到生个孩子竟然这么累这么扎心。我真羡慕人家年纪轻自然怀的,没有痛苦又没有压力。”

李思和丈夫有的时候也会灰心,不想做了,但还是不甘心。夜晚卧聊的时候,两个人说到最后,说“不管了,反正都拼成这样了,就拼到底”,然后关灯睡觉。

“只有两个大人,总感觉有缺憾”

都拼成这样了,为什么还要拼下去?李思说,没有孩子总感觉有缺憾。

“也没人跟我们说要早婚早育,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耽误了,一路到了40多岁,才发现要个孩子怎么这么难。”

她说,总是希望争取一下再争取一下,“虽说人生是为自己活的,两个大人可以继续忙工作,但经济上再怎么好还是有点缺憾的,有个孩子好像圆满一些。”

来自张家港的小黄算是心态比较好的,她喜欢孩子,但对要孩子没有执念,她自嘲“心大”,“我现在心态还行,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压力,没有说今年一定要怀孕,就顺其自然慢慢来,做试管时第一步就卸载了社交平台,越看越焦虑。”小黄刚刚完成相关检测,也还没有进入周期。

而她之所以会从张家港特地来上海咨询,更多是被父母催过来的。小黄属蛇虚岁36,但周岁也才34

岁,“我很懒,感觉成本很高又很麻烦,懒得去检查,我和老公工作也忙,家里受不了了,催我们去检查。从小到大大一起长大的发小已经结婚生子希望我也有个孩子,她们在上海,就帮忙打听了一下医院,我想那就过来先看看。”

第一次看医生,小黄是在两个闺蜜和丈夫的陪同下过来的。

相比之下,备孕急切的小林得到了父母的支持,“身边的人都比较尊重我们,家里老人也给了很大的鼓励,希望我们有下一代。”甚至同为女性的母亲反过来安慰小林,“我妈妈希望我以快乐为主,不要有太大的压力,但是我自己还是很渴望要一个宝宝。对于受苦,我觉得,既然要孩子肯定要付出,这些只是未来生命长河当中很小一部分的付出。”

和小黄、小林不一样,Vicky和丈夫并没有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:“我老公是马来西亚华人,相比传宗接代他认为夫妻关系更重要,我来自安徽,生活也比较独立,准备做试管了,对家里只是简单告知了一下。”

Vicky和丈夫有着医护们也公认的好心态,“很乐观,这样的患者真的不多,”Vicky的面谈接待医护人员说道。

Vicky也喜欢小孩,她说:“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沉重,就觉得这个年龄段想要做这个事情,所以就开尝试试管婴儿了。没有太过于焦虑,该上班上班,该出去玩出去玩,比较平常心。如果真的没有孩子,肯定会可惜,因为我们还是喜欢孩子的。但真的没有的话,也能欣然接受,过两个人的生活。”

谁来陪伴度过痛苦

痛苦永远无法被感同身受,只有有过切实经历,才更能给予力量。

2018年,一群来自上海的志愿者们自愿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组织,叫幸福公益团,组建的群叫幸福家园。一开始是病友们自发拉的群,后面医生也会推荐病友加到这个群里面,一些细节问题、流程问题医生没有时间跟病友聊,病友或者志愿者可以来互助回答。除了线上的群,每周二下午还会组织“幸福倾听”活动,由临床医护、社工与志愿者联动,请心理咨询的老师过来,为病友提供面对面的心理疏导;“幸福锦囊”则是由志愿者配合医护人员开展的线上和线下科普义诊活动;还有定期组织的患友沙龙,提供陪伴就医服务。

做两次B超有胚芽胎心出来了,在这里被称为“毕业”,准妈妈准爸爸们会收到一张毕业证书,医生作为班主任签名,交给妈妈们。“毕业”的妈妈会主动在群里发小红包,与姐妹们互勉,分享喜悦,接力好运。

病友们自己设计了各种“幸福公益团”手工品,还有“幸福公益团”帆布袋也是她们自己设计、自发制作的。

每个接受采访的妈妈都会主动提到这个群,她们自然地说群里姐妹们的故事、姐妹们的经验,那里是比网络更加直接准确的信息分享渠道和情绪发泄的自留地。痛苦被分享,引发共鸣,就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承受。

哪怕在互联网时代,试管夫妻们依然是孤军奋战,而这个公益组织让她们不再是一个人的队伍两个人的队伍,那些群里的分享,像是她们独自前行时的火炬,给予指引也温暖人心、抚平伤痛。